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细说从头】	“九一三”回望（上）	余汝信
【亡灵祭坛】	我所知道的江楠之死	高文宜
【悲惨世界】	十五岁的林永生在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王友琴
【恐怖年代】	戏校文革记忆：江枫死于红八月	任 均·王克明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二）	吴中杰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细说从头】

“九一三”回望（上）

• 余汝信 •

《“九一三”回望》原是我主编的2013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我想将它作为这次讲座的主题。2013年迄今，“九一三”的研究有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我们的认识又大大向前了一步。今天，我想以近年来的一些新材料为依据（以及对一些旧材料的新认识），讲一下文革走到“九一三”这一步的过程。这是以我个人的理解对这一事件的史实回顾，至于发生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剖析，恐怕不是这一次讲座就能完成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道扬镳

“九一三”这一结局，实际上是毛泽东、林彪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九大是林彪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九大一年多后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使毛、林之间的裂痕加深，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歧的表面原因是，对毛的宣传，毛自己要降温（毛内心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把对我的宣传变成宣传你自己），而林坚持不降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毛想换接班人了，而林却坚决维护自己接班人的地位。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吴法宪通过叶群向林彪报告了8月13日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关于这次争论，吴法宪在1971年4月9日检讨时称：在那次会议上，对宪法的写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我平时对张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提出这个问题很反感，后来又听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

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顶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吴法宪的报告，促使林彪在8月23日下午大会宣布开幕后，发表了不点名地针对张春桥的即席讲话。

林彪在讲话中称：“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那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这是过去的思想，已经结束的思想，毋用发展嘛，只要旧的就行了嘛。……，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1〕

林彪在这里其实是将对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重新阐述了一遍。问题是张春桥的意见并非个人自作主张，毛在审阅九大党章时即圈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林彪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仍坚持己见？

林彪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设国家主席问题。林在讲话中说，“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提法，是与在全会前已定稿的宪法草案相一致的，只不过“国家元首”这一称号在宪法草案中是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

8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以华北组的发言和讨论最为激烈。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引用了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三段话后，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称：“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汪东兴接着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批评，并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陈、汪发言后华北组群情激愤的情况，充分体现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上：“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

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8月25日中午，毛泽东听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下午，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九届二中全会的最终结局是：陈伯达被清洗；李雪峰、郑维山受牵连相继倒台；汪东兴检讨过关（事后证明，汪是毛氏家族的最大威胁之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林彪一系从此不被毛信任，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从本质上说，陈伯达、汪东兴都是对江青、张春桥有所不满的。1970年，他们都想借林彪的力量去扳倒张春桥（还不至于要直接向江青发难）。他们误以为，如果挺林反张，毛肯定会支持林彪。他们错了，他们连带误导林彪一系将领也错了。毛泽东是宁愿不要林彪这个名义上的接班人，也要他自己的老婆，因为在毛的心目中，江青、张春桥才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真正传承者。

二、毛对叶群检讨的严厉批注

1970年9月22日，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自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

10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叶群与吴法宪一样，也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注。叶群在检讨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横线，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检讨中说：“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横线，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叶检讨中说：主席讲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叶检讨中说：“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检讨中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检讨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

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检讨中说“过去对他（指陈伯达——编者注）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检讨中说：“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开完大会回家，陈伯达来见林彪同志。我们劝他回去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批注：“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叶检讨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横线，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在叶的检讨结尾处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2）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她丈夫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下如此详细、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叶群表面上不得不服从，惟对毛泽东的怨恨，必然悄悄在内心滋长。

三、《“571工程”纪要》

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唯一的儿子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的反毛情绪，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愈发积蓄滋长。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在1971年3月间草拟的《“571工程”纪要》。惟他们的能力与其计划、目标相差甚远。无论如何，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是导致“九一三”发生的重要因素。

据官方称，《“571工程”纪要》是“九一三”后“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的。官方又称，经李伟信（空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党办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空军党办副处长）的其他记录本笔迹核对，证明是于新野手记。目前，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林彪、叶群知道及看过该《纪要》。

《“571工程”纪要》中称：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3）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4）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

1971年11月14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通知将《“571工程”纪要》发至省、军级党委。该通知称：“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现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编号发给你们，供你们阅读研究。此件只限于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的成员阅读。”（6）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将《“571工程”纪要》扩大发放至全体干部群众。

有人说《“571”工程纪要》是毛与康生等人编造的。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文件，能在“九一三”仅仅两个月以后就能编造出来。

四、林给毛的一封信

1971年5月23日，林彪向秘书口授了给毛泽东的一封长达一千一百多字的信函，全文如下：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映。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的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付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

2016年3月31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原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和林办机要秘书于运深，向李、于两人展示了林彪信稿原文的影印件。

李根清称，信稿是他的笔迹，毫无疑问，这份信稿是他誊清的。于运深也说，信稿是他记录的，其中“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这一句话，是他对照林彪口述记录稿，发现李根清的誊清稿漏了这么一小段，于是由他添写上去的。

我注意到了林彪信中有关“乱命”〔7〕的提法。林彪称，“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林彪声称“除主席以外”，恐怕是语带双关的“客气话”，恐怕林内心所指，其实也隐含了毛在内。

以当日情势而言，林彪致毛信中用上“乱命”这样强烈的带刺激性的语言，所表露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不无道理。林在这里提出的“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是因陈伯达问题无辜牵连至李雪峰、郑维山有感而发，所涉不仅包括黄、吴、叶、李、邱和林自己，还应包括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等一批高级将领以及汪东兴等人。

林信中“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表面上是避嫌，其实是直接宣示了对毛的不满。三十八军是毛手上打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正如毛所称，“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子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林明知毛所好而欲要其弃之，明知事不可为而言之，以林对毛了解之深，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窃以为，这恰恰反映了林最后对毛的抗争心态。毛、林走到此时，裂痕不可愈合，已是必然。

李根清称，他与于运深都记得，当时做了两份誊清稿。只是为什么搞了两份？个中缘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看到了誊清稿的复印件，才豁然省悟——原来信稿誊清后，于运深发现漏了一小段，就给补上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件，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修补文字的，李根清便又工工整整誊清了一份。于是，信稿就有了两份誊清件，一份可以送毛，另一份存底。

据此，可以大胆假设：重新誊清的另一份信稿，很有可能最终由林彪签名并署上日期送了给毛。

无论这封信最终是否送到了毛的手中，林彪在信中所表达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是明白不过的。这封信是林彪思想的明确表达，是林毛歧见的一份重要证明。5月20日，林彪已与周恩来谈过并要周“考虑和请示主席”，周极可能不敢隐瞒林的要求而随后报告了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不排除毛在当时已经知道林的这些想法，但没有理会林的建议，反而加紧了围剿林的行动。

五、毛南巡讲话〔8〕

在北京的政治气氛表面风平浪静了一段日子之后，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场更猛烈的黑色风暴悄然降临。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下中南、华东等地“巡视”，就庐山会议“没有完”的问题向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亲自发动各地诸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以彻底解决林彪一系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谈话，无一不是尖刻地、明白无误地针对林彪及黄、吴、叶、李、邱。毛这些谈话，成为林彪出走的直接诱因。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在武昌车站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汪东兴谈话。17日，毛在武昌与刘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河南省委书记王新和汪东兴谈话。

毛在讲述了中共的历史后，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称：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

误。)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8月25日晚,毛在武昌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谈话称: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8月27日,毛再次给刘丰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称: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

(还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生气地称)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毛还对刘丰讲: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8月28日晚9时，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毛在谈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历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后接着称：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接着称：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

（毛对丁盛、刘兴元、韦国清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毛称：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毛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专门强调他的谈话与批陈整风会议是不同的）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对刘兴元、丁盛称）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独生子。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8月31日晚，毛在南昌住地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和汪东兴进行了谈话。9月2日，毛准备离开南昌，临行前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了40分钟。9月3日，毛泽东专列到杭州后，找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二十军政委兼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委书记、二十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省委书记、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9月10日下午，毛专列由杭州出发，晚抵达上海。9月11日上午，毛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9月12日中午，毛的专列驶抵丰台。毛在车厢里与应召前来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16时多，毛的专列抵北京站，毛乘车回到中南海住地。此时，离林彪、叶群、林立果登机出逃，已不到八个小时。

（未完待续）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

### 【亡灵祭坛】

#### 我所知道的江楠之死

• 高文宜 •

巫宁坤教授走了，给世人留下了记录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史的传世之作《一滴泪》。书中提到安徽大学俄语教师江楠的惨死。江楠是我的二舅母，印尼归国华侨，她为人温和善良，乐于助人。我曾亲耳听过我二舅林兴讲述江楠的惨死。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说江楠是他的牵连，被下放到农村，因为长得漂亮，被安徽大学工宣队的几个人轮番奸污，含冤自杀，尸体埋到荒郊野外，被野狗吃得只剩下白骨。

我是家中长子，小时候江楠很喜欢我。那时她和二舅都在外交部工作，出使保加利亚，每次回国，都请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送给我礼物，逗我玩。六十年代初，他们被排挤出外交部，下放到安徽大学，来往就少了。在我的印象中，她很喜欢孩子，人长得漂亮，会打扮，穿着洋气，与当时一片灰蓝的众人色调不同。文革结束后，我得知江楠惨死，心里很难过，这成为我的一个心结，决心一定要弄清真相，替她讨还公道。我经过多年多方打听调查，总算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 一、事情的缘起

江楠的惨死，是由于受到纠缠林家兄妹三人多年的所谓“电台案”的株连。我的外祖父林步随是林则徐的曾孙，他是光绪末年进士，曾任中国留美学生总监督和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抗战爆发后，他已寓居在家，但有民族气节，决不和日本人合作。当时北平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我母亲林锦双（傅秀）为了抗日救国，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北平地下党，把位于南河沿的林家作为抗日活动的联络站，掩护过被日本宪兵队追捕的爱国人士，向抗日根据地输送过青年学生和药品。1942年5月的一天，地下党的直接领导我母亲的张宏飞提着一个小黑箱子到我母亲家，叮嘱要收藏好，别的什么也没说，母亲也不便问，把箱子藏在自己屋里的床下。几天后，地下党出了叛徒，供出我母亲家是抗日的据点。母亲随即奉命紧急转移，临走前向大舅林曾同匆匆交待替她保管好那个黑箱子。

就在第二天夜里，日本宪兵队一群人跳墙进入母亲家抓人，扑了空，留下三人蹲守，并把全家人看管起来，连瘫痪在床的外祖父也不例外。外祖父的家是个三进三出的大宅院，房

间很多，日本宪兵队急切之下来不及翻每个箱柜，什么也没有搜出来，悻悻而归。大舅林曾同突然想起我母亲的交待，趁看守不备，溜进母亲的屋子，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全是电讯器材（电子真空管）。他和二舅林兴在看守的眼皮子下一个放哨，一个动手藏，把电讯器材四处分散，藏在壁炉烟道和屋内顶棚里。我母亲在离开北平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前，曾悄悄潜回家拿御寒的衣服，才得知箱子里装的是电讯器材。

日本宪兵队一直盯着我母亲家，半年后，他们又把二舅林兴抓走，对他动刑，逼问母亲的下落。文革结束后，林兴劫后余生，来北京时和我说了当时的经过，日本人先是用毛巾蒙着脸浇凉水，但林兴喜好运动，能憋气，日本人又灌辣椒水，踩肚子，坐老虎凳，严刑逼供，但林兴确实不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抓不到把柄，最后日本宪兵队只好放人。

中共建国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在肃反运动中，要求人人要写自传，把自己历史上所做过事情，事无巨细，都向党坦白交代。林曾同在自传中主动交代了掩护这箱电讯器材的事，结果惹出麻烦。他所在单位把这当做大事，派人外出调查，幸好找到当事人张宏飞，他证实那是他存放的抗日捐赠物资。调查人员还专门去了当年外祖父的宅院，果真在壁炉烟道和屋顶棚找到当年存放的电讯器材，其型号和年代，确实是当年的产品。经过一番审查，组织上最后给这件事做出“存放的是抗日电讯器材”的正式结论，并把结论抄送给我母亲和林兴所在的单位。

## 二、文革中再翻旧案

文革浩劫中，林家三兄妹在劫难逃，先后大祸临头，他们年轻时为了抗日救国而投身的这场革命变了味，他们成了祭奠这场革命的牺牲品。我母亲首当其冲，她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在家里和别人讲了几句真话，议论了肃反时康生如何在北京医院装病，躲避审查，而医生们认为他根本没有病，还说了江青在北京医院养病时如何整治护士，如让护士一天给她织一件毛衣，还强迫护士跪着给她洗脚等。母亲担心这帮人上了台，国家可要遭殃了。结果祸从口出，母亲的朋友将她出卖，造反派将此材料报给康生。康生在母亲的上报材料上亲笔批示，说母亲是“杨献珍的走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八年五月，母亲被从家里抓走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说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奇怪的是关到秦城之后审讯的人对“炮打”一事一概不问，只是再三追问燕京大学地下党和电台问题，原来他们推翻了以前的结论，硬要把电讯器材零件说成是电台，把为抗日捐赠说成是为联络敌伪，他们上挂以刘仁为首的北平地下党，下连燕京大学的抗日知识分子们，甚至对夏仁德教授为燕大学生收藏过抗日文件也说成是燕大地下党被外国人操纵。燕大女同学何美一（后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因为去我母亲家被日本人带到警察署审问过，文革中也被关进牛棚。

后来我才明白，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首先烧向了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北平地下党已被文革权贵们定为特务党，但一直也没有抓住任何证据说明它有问题，直到1968年夏天彭刘专案也无法定案。此时，毛泽东和文革权贵们急着召开九大显示“胜利”，因此提出“专案工作要为政治服务”，给了专案组“先抓人，后找证据”的权力，首当其冲的是燕大地下党，他们以“电台”事件开刀，重翻旧案。

## 三、中央专案组是始作俑者

从1968年夏到1969年秋，林家兄妹接连遭难，先是我母亲被关进秦城监狱，然后是林兴被宣布有严重问题，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牛棚，江楠因此被下放农村，被工宣队轮番强奸，自杀身死。这一连串残害林家人的事件谁是主谋？1968年6月，我打听到地质

部军代表郭毅住在报子胡同（母亲在地质部工作），便硬着头皮闯到他家，郭毅是个老军人，一见面他就劝我不要再写上告信了，他说：“批准逮捕你母亲的就是总理周恩来，他是根据辽宁大学造反群众的揭发，并没有向地质部核实，已经把此案交给中央一专办彭刘组管（中共中央第一专案审查办公室彭真刘仁组），只有地质部专案组的人才能和他们联系，我们都不能过问。”我很震惊，原来是周恩来批准抓我母亲的，他是中央一专办牵头人，出面替康生报私仇。周恩来明明知道我母亲在自家议论康生并没犯法，但还是强行逮捕，先抓了人，后找证据。把我母亲关进秦城之后，他们捏造了一个假罪名：把当年为抗日出力的林家说成是敌伪特务的联络点，把被掩护的电讯器材零件说成是敌伪电台。他们在地质部成立了我母亲的专案组，在安徽大学成立了林兴的专案组，专案人员受一专办彭刘组直接领导，而一专办向总牵头人周恩来汇报。

四人帮倒台后我见到林兴，证实了中央一专办彭刘组就是林兴被监禁审查的幕后指挥者，他说：1968年11月，工宣队接到一专办的通知后，立即成立了林兴专案组，把我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的牛棚，把江楠下放农村。他们反复追问我，1942年夏掩护电讯器材的经过，以及当年你母亲带我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经过。很显然他们想要从我口里找出疑点去整你母亲。当年日本宪兵队想从我口里得到你母亲的消息，他们拷打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是什么也没得到。这次是工宣队，他们逼我交代你母亲的问题，揪斗游街单独监禁，仍然什么也没得到。可是工宣队祸害了江楠，只剩下从荒野里捡回来的骨头，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说着说着泪水顺着这个硬汉子的脸膛哗哗流下，这情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年的“中央一专办”权力之大可与当今的“中纪委”有一比。我曾亲身同一专办彭刘组军代表们打过两次交道，他们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宽街一所幽静的院落内。第一次打交道是在1968年秋，我借给母亲送几件过冬的衣服为由，问他们我母亲究竟有什么问题，他们神情紧张，避而不答。追问我是谁告诉一专办地址的，声色俱厉的要我揭发母亲的“罪行”。原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能证实林家罪名的材料，正在气急败坏之时，得到母亲的同胞妹妹林子东的揭发材料，林子东交代说：“电台来路可疑，傅秀是鬼域人物…”“1956年傅秀在全聚德招待为电台案做证明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对抗审查的攻守同盟…”。专案组如获至宝，逐条逼问我父亲。他们得意地说：“林子东都说傅秀是鬼域人物，她绝对不会诬陷自己姐姐的。”于是总参海运仓学习班开大会批斗我父亲，专案组对我父亲辱骂恐吓，动手打人，不让睡觉，不让回家，非要我父亲承认母亲是特务。连陪斗的张先生不能忍受这种人身侮辱，跳楼自杀摔断了脊椎骨。林兴就是在这时被一专办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他与忧心忡忡的江楠分了手。但是一专办从林兴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第二次打交道是在1974年夏，一专办彭刘组副组长军代表唐某找我谈话，此时江楠已经惨死，我母亲被关秦城六年精神失常，拒食脱水，奄奄一息。为了救母亲我曾求外交部龚普生大使将我的求救信转交给邓颖超，据说邓接过信后连一眼也没看便扔在桌上，严肃地批评龚大使说：“以后少管这种闲事，不要给恩来惹麻烦”。我很不平，明明是周恩来非法抓人，把母亲监禁到奄奄一息，也不让治病，这是“闲事”吗？这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女人，内心真是冷酷无情，胆小自保，见死不救。

幸运的是我还有另一封信，由父亲转递叶剑英元帅，据说叶帅批示要一专办治病救人，一专办才不得已找我谈话。这个谈话的人姓唐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的，他说：你也不要到处写信告状了，信都转到我这里了，我们安排你母亲去复兴医院，“保外就医”总该可以了吧。唐某还恶狠狠地说：你母亲议论康生和江青同志是有罪的，你要划清界限。

中央一专办替权贵们报私仇有恃无恐，对被审查人却“查明无罪，也不释放，关死为止”。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释放任何犯人都需要经过中央一专办的牵头人周恩来签字，而周恩来要等到文革权贵同意才肯签字。我母亲的案子涉及康生江青，释放母亲要经他们同意才行，这如同与虎谋皮。实际上，林家的“电台”冤案早已查清，连捐赠此箱抗日器材的人和直接经手的人都找到了，并且做了证明，一专办还是不结案，林兴仍然不能释放，就这样放走了残害江楠的工宣队，使他们平安回到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犯罪人互相包庇，至今逍遥法外。

#### 四、文革激发人性之恶

文革把一批马鞍山钢铁厂的工人送进安徽大学，让他们有机会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中央一专办指使工宣队关押林兴，使他不能保护妻子。这些举措激发了马钢工人的丑恶的兽欲，他们趁火打劫，轮番侮辱强奸了被审查人的妻子江楠。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冬，工宣队故意把林兴江楠夫妇分在两地，先是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宽严大会上宣布林兴有严重问题，把他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牛棚内，随后又把江楠下放农村。工宣队头目们借调查林兴问题为由，在谈话地点轮番强奸了江楠，并威胁说如果胆敢泄露，将严办林兴。孤独无助的江楠上告无门忍无可忍，曾将此实情告诉过知心好友李怡楷，她是巫宁坤的夫人。不久江楠发现自己有孕了，她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去医院打胎。但那时打胎必须提供男方姓名。这个头目不但不给开信，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露工宣队强奸她的秘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江楠走投无路，想到将要带着这种奇耻大辱活一辈子，她痛不欲生，曾对好友吐露过唯有一死了之。江楠还凄惨的说：如果有一天看到她的窗前摆着一盆花，那就是她已经走了，请在林兴获得自由之日，转告他江楠是清白的。

据《一滴泪》记载，江楠是在她所住的社员家上吊死的。这帮毫无人性的马钢工人在伙房墙上门前贴满黄纸标语：“江楠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一滴泪》说“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有人不忍心挖了几锹土盖上…”。后来林兴告诉我更多更悲惨的情景：“她的坟再次被盗，盗走了她身上仅有的衣服，留下赤身露体的江楠躺在荒野里多日，野狗把尸体撕咬得残缺不全，只剩下白骨…”社员愤怒的质问：“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文革后江楠一案虽然得到平反，赔了一点钱，但是对犯罪人的调查至今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

#### 五、梦见江楠

2019年8月22日，在美国北弗吉尼亚的一个教堂里，上百名各界人士参加了巫宁坤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肃穆，教堂里全体人员起立，伴随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目送巫老师的灵柩缓缓离去。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说：“梦里我又见到江楠了，同样是文革难友，死后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啊。那年我要是能够救出江楠就好了…”。

江楠没能救出，但是《一滴泪》记录了她生前身后的悲惨遭遇，它告诉世人发生在五十年前安徽农村的一幕：工宣队集体残害一个被下放的普通女知识分子，死后被暴尸荒野，任凭野狗凌辱尸体的真实故事。江楠自杀是受我母亲案子的牵连，冤有头，债有主，写出来为历史作证，为把所有涉案的恶人包括始作俑者中央一专办和它的牵线人都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这些披着人皮的鬼魅再也不能害人了，让江楠在天之灵得到安宁。

（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于美国马里兰州）

□ 原载《华夏文摘》2019年9月10日

~~~~~  
【悲惨世界】

十五岁的林永生在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 王友琴 •

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文革受难者》一书，书中有659名受难者。我和很多文革经历者谈话，寻找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难者情况。但是，有的受难者，虽然他们被打死的事情，是不止一名受访者知道的；他们被殴打和死亡的地点是知道的（因为是在公众面前被打死，并非在秘密的地方）；甚至他们被殴打的声音以及其他细节也是受访者听到或看到的，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找不到了。

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受难者的名字按照姓名的拼音字母排列。这是基于我的一个理念：所有的受难者都是平等的，都是重要的。但是死亡情况确实，名字却不清楚的人，怎么排入此书中呢？我只好在A-Z开头的名字的后面，设了特别的一章，题为“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在这一章里，受难者是按照他们的死亡地点排列的。

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一章中，有北京第27中学的一名初二女生，在1966年8月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数位受访者记得她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没有找到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文革受难者》书出版14年后，我收到了一个辗转送来的“微信”。写信者说，这个女学生是他妻子的发小。这名女学生名叫林永生，她在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她初中二年级，七班，15岁。

在北京的朋友开始联络林永生的家人，从而知道了详细的情况。

林永生原名王广平。父亲王磊，母亲林永彦。家中共有儿女五人。她是第二个孩子。父亲王磊在1960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文革后被释放了）。母亲和其父亲离婚，并把所有的孩子都改为母亲的林姓，希望以此能保护孩子。王广平因此改名为林永生。她的母亲在2017年去世了。

家人说，那天学校开大会。学校没有那么大的礼堂，所以学生们都坐在室外地上。林永生那天来例假，开会中间去上厕所，把她的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放在了地上。她从厕所回来，红卫兵说她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是“侮辱伟大领袖”，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被打死。

林永生的母亲被叫到学校。她把女儿的尸体背回了家中，放在床上擦洗，洗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送去火化了。

几天后，几个红卫兵到她家中强要了20元钱，“理由”是打她时把打人用的皮带打坏了，要她家人“赔偿”。（这样残忍和荒唐的事情，在别的学校也曾经发生。）

她家被红卫兵抄了。全家被赶出家门。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才回到城里原来的家中。

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在校中被打死，她的名字被忘却，在正常的年代会被看作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了解文革和1966年红卫兵暴力的大背景，就能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1，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迫害的最高峰时期。中学生红卫兵打死人从8月5日开始，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校中被打死。接着，8月7日，通县一中副校长程珉在学校“劳改队”中被殴打折磨致死。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学教员陈葆昆在校中被打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暴力大规模升级。在林永生被打死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打死。从8月26日到9月1日，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人被红卫兵打死，最多的一天（9月1日）高达282人。

2，红卫兵的加入条件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称为“混蛋”，或者更难听的“狗崽子”——意思是他们的父母是“狗”，他们是“狗”的孩子。红卫兵不但殴打甚至打死他们的校长和老师，也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林永生虽然改了姓，但是不起作用。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106中学高一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9月27日，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私设的监狱里，都是例子。文革前，“家庭出身不好”青年就受到歧视，例如不准上大学甚至不准上中学。但是公然把他们叫做“狗崽子”和殴打甚至打死他们，是文革造成的。

3，红卫兵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崇拜高潮。当时人人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本，佩戴毛泽东像章，到处张贴“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于是，和毛泽东有关的这些物件若被损坏，无论真假，都可以作为残酷殴打和迫害人的“理由”，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林永生生于五十年代，不可能和前政权或者私有财产有任何关系，却被用“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底下”的罪名活活打死了。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罪名，在文革后才取消了。

4，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红卫兵暴行，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在教育工作者之外，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是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的人。很多私人房产主被活活打死，或者被扫地出门。林永生死后，他们家被驱逐到平谷县农村。他们的房子被没收占用。她家住的房子是她祖父的，祖父曾开过家具厂。她外公曾开过绸缎商店。他们都算是“资本家”，紧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阶级敌人”之后。即使林永生没有“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这样的所谓“罪行”，他们家也会遭到抄家和驱逐。北京那个时期驱逐了九万多人。人们可以合法买房子和开店铺，是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才又开始的事情。

至于林永生的名字被忘却，那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大量受难者的名字被忘却了。尽管文革发生并不遥远，但是调查文革事实却可能比调查古代历史还难。一方面，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中，不愿谈及。另一方面，邓小平虽然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发表关于受难者的报告受到严格控制。一名历史学刊的编辑说，“写文革的文章不能发表，不发表文章就不能升职称，不升职称就不能涨工资……。因此，没有人做文革历史的调查和研究。”

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受到文革的强烈腐蚀。一名受访者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迫害死了，普通人的死又算什么呢？

如果普通人的死不算什么，那么，在普通人中，林永生的死就被更不当作什么了。文革后，对文革中被害死的在职职工，北京的标准补偿是420元。这是按照文革前职工死亡的标准给的。其中丧葬费240元，抚恤金180元。林永生不是职工。她只有十五岁。和我

通过采访找到的659名受难者相比，她是最年轻的。但是，从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她的死，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死一样应该得到记载，应该受到纪念。她对她的死，一点责任都没有。她完完全全是无辜的。对一个无辜的少年人被打死采取忘却和隐瞒态度，会是人类社会的癌症，侵袭着社会的健康肌体。

感谢林永生的母亲。在林永生死后，虽然生活动荡，但是她保留了林永生的照片。因此，在53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她。她是真实的历史，她见证文革的罪恶。

三张照片中，有一张是彩色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彩色照片，那是用特别的彩色笔在黑白照相上染了颜色，一种那时候保留色彩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她的形象就是彩色的，她也一定有过彩色的梦。她的姐姐说，林永生喜欢唱歌，还特别喜欢好看的花裙子。——这不正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会有的特色吗？假使她没有在1966年被打死，她应该还活着，68岁。这个年龄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还活着。她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53年了。今天的人们记住林永生，不是为了她，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社会中的公正与安全。

写完于2019年8月23日

◇ 附录

〔下面是《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当时还是“未知姓名的受难者”的林永生的描述。感谢数位知情者在十七年前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些记录虽然不完整，但是相当准确。这也说明，一些前红卫兵这些年来宣扬的“故事不是历史”的说法的荒谬。（他们说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我也感谢一组在校大学生。针对那些说什么“故事不是历史”的文革暴行否认者，他们给我写信说：历史不是故事。这些年轻人的意思十分明确。历史，不论多么恐怖或丑恶，都不能当作虚构小说来看。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我希望通过日渐普遍的电子通讯，会找出更多的林永生这样的受难者的名字。〕

《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北京东城区第27中学》

第27中学初二的一名女学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及被指控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体下面，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在北京市中心，1949年以前的名字是“孔德中学”。原为中法大学附中，所以用法国19世纪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这是“五四”时代北京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校址原来是紫禁城附属的孔庙，教室是旧式的殿宇。

第27中学的高干子弟很多，因为学校两侧就是南北池子、南北长街，都是独门的四合院，1949年以后住进了很多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学校附近。这个学校也有很多军人子弟。1966年8月红卫兵兴起“破四旧”的时候，把这所学校改名为“解放军中学”。

三位受访者都知道有这样一名女学生被打死。其中一人还知道打死她的红卫兵的名字。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学生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女学生被打死的准确日期，但是可以肯定是在1966年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残酷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了老

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残酷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对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时的学生还记得。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被骂做“混蛋”的学生，随时可能被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一位受访者说，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一次在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垫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反革命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那是一间平房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有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学校的人都知道，“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不止是这一个初二女生。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是同班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六年级的时候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残酷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得这样凶暴？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参与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皮带上的铜头都打碎了一个。目击者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她是在当天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这位目击者来到学校，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用来端水浇醒她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一位被访者说，他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一人。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群子弟在北京“松鹤楼”饭馆聚会。文革前他们的父母在中宣部任职，子弟们住在机关宿舍而互相认识。34年以后，“四阎王”之一出现在聚会上，没有听到她回顾文革中的行为，没有听到她为所作所为忏悔。聚会的气氛，使得这位被访者最终也没有能开口问她1966年她参与打死的这名同校女学生的名字。

那些被“四阎王”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这位初二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实现她的梦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而且，在34年后被完全忘却了。

除了这位女学生，一位被访者说，该校还有一位女教师，当时被毒打还被关押在校中。这位老师用眼镜片割破自己的动脉自杀。

2001年笔者写信给北京第27中学领导人帮助查阅档案，发现在1966年8月被打死的女学生叫什么名字，以及那位女老师的名字。没有收到回信。希望读者中有人能帮助发现他们的名字。

〔载《文革受难者》509—511页，或 ywang.uchicago.edu/history 上的电子书，625页〕

现在我们知道了她的名字，林永生。

□ 作者投稿

~~~~~

## 【恐怖年代】

戏校文革记忆：江枫死于红八月

• 任 均 • 王克明 •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文革”前，我从沈阳调回北京，被安排到北京戏曲学校（那时候叫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工作。到那儿没多久，还没干什么，“文革”就开始了。所以，对北京戏校，我只记得“文革”时候的事儿。

“文革”初期，因为运动迫害，北京戏校死了四个人，按时间顺序，他们是江枫、叶盛章、马连良、王少楼。

马连良当时是北京戏校的校长，“文革”一开始，学生就去他家闹，红卫兵还占领了他的房子，好像是当司令部用。他被折磨得厉害，1966年底犯了心脏病，死了。

叶盛章是个老艺人，在戏校当老师。“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批斗抄家。1966年8月底的一天听说，学校里正开着批判会，他从学校的一间屋子里跳窗户跑出去，直接跳进龙潭湖自杀了。这是传说。其实，他怎么死的，至今没人知道。

王少楼也是老艺人，是位兢兢业业的好老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又是首席老生教师，我跟他有些接触来往。他是个老老实实、和和气气的人，对谁都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他年轻时也曾是名角，但40年代嗓子就坏了，因此曾经生计困难。建国后进入这所学校工作，待遇很好，他心存感激，于是非常敬业，教戏认真得很。“文革”开始后，大家都投身革命，学校里的课都停了，只有他还坚持给学生上课，认真地讲戏。“文革”开始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罪名，只是“三名三高”——名人、名专家、名教授，和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那时候说，凡“三名三高”的人，都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都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所以也都成为革命对象、“牛鬼蛇神”。开始没设立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牛棚”时，他们白天到单位上班，脖子上被挂个大牌子，垂在胸前，挨批斗。牌子上面写着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身份说明，再写上他们的名字，画个叉，说明此人被打倒了。下班时，他们可以把这牌子摘掉，自己回家。可王少楼是老实人，红卫兵给他挂的牌子，他不敢摘，就自己一个人，挂着牌子坐公共汽车回家。那时候，我在街上也见过别的挂着牌子自己走路的人，心想，这也是老实人。王少楼当时血压高已经好几年了，高压能到二百多。可他怕误了教学，没跟学校说过，所以从没误过一节课。“文革”起来后，他老挨批斗，精神上非常紧张。1967年初，学生们再到他家一闹，他一下子又血压升高，就死了。当时学校里人都说他是被吓死的。说实在，他纯粹是被“文革”迫害死的。

我们学校最早死于“文革”迫害的，是江枫。江枫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那时候担任北京戏校副校长。在延安时，我跟她就认识，只是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知道她喜欢戏曲，虽然不在延安的文艺单位工作，但她曾业余上台演出。她的丈夫叫吴子牧，也是延安老同志，年轻时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有学问，曾陪同杨虎城去西班牙，访问二战中保卫马德里的战场和国际纵队。“文革”前，吴子牧是北京市大学工作部部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被调到外交部，准备派出国去当大使了。

还有一个月，江枫就该离开北京戏校，出国去当大使夫人了，已经置装做衣服了。但没等上，“文革”就忽然开始了。江枫在我们学校挨斗挨得非常厉害，校长的尊严一点儿都没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吴子牧比她还惨，被揪到各个大学，轮着批斗，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对这样一个有很高学问的人，批斗者可以随便打，任意往他身上踩，说是“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可怜啊！我并不认识吴子牧，但知道了批斗吴子牧的情况，心里非常难过，忍不住哭了。现在想起，仍难过得落泪。

吴子牧被人从家里揪走前，嘱咐江枫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挺住。但是江枫没挺住。我们学校收发室有一位须发花白、人略胖的老头儿告诉我，那天中午，来了一群孩子，附近其他小学的小学生，要批斗江枫。那时候，谁想批斗人，都能找个学校，找一个听说是有问题老师，拿来就斗，想斗谁斗谁。这位传达室的老头儿看不惯，想护着江枫，就冲孩子们吼：“这儿睡午觉呐！小兔崽子们，要干什么？都滚！出去！”轰孩子们走。因为老头儿算工人阶级，孩子们不能把他怎么样。那时候，真难得能有像这位传达室老头儿这么好的人呀！我曾想，我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以后告诉别人，便努力地记。但时间久了，还是给忘了。他轰孩子们走，但孩子们不理睬他，没被他轰走。就这样，骄阳烈日底下，一群小学生、小孩子，命令江枫跪在地上，围起来斗争她，侮辱她。

那天是1966年8月17日。晚上，江枫回到家里，把自己拴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她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第二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江枫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略黑，但挺漂亮的。她和吴子牧是1938年春天一起去延安的。她死后没几年，吴子牧就发现了癌症，1970年也死了，五十多岁。

我们学校还有位来自晋察冀的老革命袁声，当时也是副校长。他很了解政治运动，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他清醒地知道群众暴力的可怕。因此，每当群众斗他审他时，他就什么都承认。说他反对毛主席，他就说：“我反对毛主席，我罪该万死……”说他是走资派，他就说：“我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结果，群众没激怒起来，他便没太多挨打。但是，一转身，到了工宣队、军宣队那儿，他就什么罪名都不承认了。他知道工宣队、军宣队是不会打他的。没完没了地批斗袁声、还让他站到桌子上挨斗时，我也曾难过得流泪：那么大年纪的人了，他怎么能经受得住？幸亏他对政治运动的认识比较清醒，得以活下来了。

我记得，“文革”时，彭真和曹禺曾一起被揪到我们学校来挨斗。彭真是主角，曹禺是陪斗。彭真喜欢戏曲，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培养，那时候便说北京戏校是他的黑据点。在批斗台上，彭真两只胳膊被人攥在身后，弯腰站着，地下滴了一片他自己的汗水，但他还强硬。斗争的人问他：“彭真！你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有百年之后？”他大声说：“我说过，谁都有百年之后！”又问：“你是不是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攻击江青同志？”他说：“我说过！我是攻击江青同志！”他态度非常强硬。斗争会上，说起曹禺不去下乡体验生活时，曹禺说是上面没安排。彭真扭头冲曹禺说：“怎么没安排？我叫你去你不去！”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人都觉得彭真挺厉害的。

学校有位黄玉华老师，以前也是名角，因此“文革”中受屈辱，大字报把她说得特别坏。她的口语习惯，总是把“我”表达成“咱们”。批斗她时，说五十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时送她条围巾。其实围巾没什么，主要是中印打完仗没几年，到“文革”时，尼赫鲁还算是坏人，所以围巾就有问题了。黄玉华说：“他送给咱们，咱们也不能不接受呀。”斗她的人说：“送给你就是送给你，谁送给咱们了！”她说：“咱们不是那样想的……”人家就说：“谁跟你咱们咱们的！说你自己！”

“文革”中有段时间老开“宽严大会”。这种大会的准确全称是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知道意思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总是在会上当场宣布对谁从宽发落、对谁从严处理。那时候的“宽严大会”，常爱揪“阶级异己分子”。这是没什么标准的，什么出身、经历的人，都可能成为这种分子。只要觉得你跟党不一心，或者说你跟党不一心，你就能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清理出阶级队伍。于是，造反夺权的人，想揪谁就揪谁，很可怕。参加这样的会，常让人有生死置之度外、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感觉。

一天，学校里开揪斗“反革命”的大会，主持会的造反派喊：“把历史反革命×××押上来！”那“历史反革命”是一位在学校里当戏曲老师的老艺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两个学生把他押上台后，主持人喊：“×××！你老实交待你的历史问题！”那老艺人弯着腰低着头，诚恳地说：“是。是。”停了停，见他没下文儿，主持人又冲他喊：“说呀！”他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问：“是，是……您听哪段儿呀？”大家听见这说相声的词儿，都忍不住想笑。我看见那主持会的扭过脸去，也一阵子没说话，估计也是在使劲儿忍住笑。过了会儿才回过头来，但厉害不起来了：“什么哪段儿？让你交待历史问题。”

斗争会，宽严会，批判会，誓师会，各种各样的会，一般都是在练功棚里开。一通知要开大会，就每人都自己搬个小板凳，去参加会，要不然没地方坐。在学校操场也开过，把各种分子们揪出来，跪一院子。我因为到戏校时间短，不言不语，不当领导，没有揪斗的由头，就没被揪出来。曾有人说我社会关系复杂，说我是谁谁派来的特务，贴出大字报，但没人响应，也没揪成。不过在宽严大会上，被揪的可能随时存在，我便总嘱咐同事小朱：“万一我被揪了，你帮我把小板凳收起来。”

小朱叫朱慧媛，当时是我们学校的年轻教师。一般造反派那种人，说话都厉害，小朱不是，她不去跟着造反。她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对我很好。她的丈夫是个医生，出身不好。两派斗争期间，他给一个工人阶级患者做手术时，医疗事故，失败了。另一派就抓住不放，说他是“阶级报复”。结果，居然给他判了两年刑，蹲了两年监狱。那时候小朱想，虽然自己丈夫是个好人，但她是党培养长大的，怎么能跟一个专政对象、判刑坐牢的人在一块儿生活呢？她就想离婚，找我谈这件事。我悄悄劝她说，小朱你要想清楚，你爱人不是坏人的话，你就别走那条道。现在冤案多得很，时间长了，什么都会弄清楚的。一定的，你得想开点儿。小朱又找袁声谈。袁声说他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医，懂医，让小朱讲医疗事故的过程。听完了，袁声说，你这事，问题不大。“右派”就右派，“反革命”就反革命，平反是早晚的事儿。再说，关起门来，还不是两口子过日子？小朱听我们的话，没离婚，后来很幸福。她丈夫坐牢两年，出来后，平反了，也什么都补发了，连“工业券”都没少给。工业券是那时候政府为了限制老百姓购买轻工业产品，而配发的购物凭证，很珍贵的。

那时候过年放假三天。一次年前，军宣队通知，让我初四一上班，就发言检查，说：“你好好想想你的问题！认真斗私批修！”我知道那不是批斗，但三言两语肯定也过不了关。于是，过年三天没干别的，就写这检查。我让大儿子延风帮我写，帮我琢磨有什么可检查的，尽量往上多写。每天弄到半夜。延风熬不住，一下儿睡着了，我就喊他。那时候，好多人都找人帮助写检查，有找儿子的，有找侄子的。因为年轻人比我们懂得怎么说“文革”。虽然建国以来，一直挖思想根源，一直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写检查，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检查什么，该斗什么批什么。只好让延风帮着编。

我们学校青年教师马尚瑞也帮我编过检查，我拿着他给写的稿子在会上念，有时一次就能通过。他是学校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我不在一个办公室，本来并不认识，开大会时遇到，一来二去熟悉起来，成了忘年朋友，处处维护我。听说要开会批判我的历史问题，他就提前来告诉我，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的“历史问题”是在国民革命军130师教唱过抗日歌曲，但这种经历不能理解为参加抗日，而得说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马尚瑞帮我写好检查交代，嘱咐我说，会上别急着说话，先听听别人怎么批判，然后根据情况念检讨，有的地方多说几句，有的就不用说了。别人批得再过分，也千万得听着，别解释。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谁巴结工宣队、军宣队了，他和我们一样，很看不惯。

“文革”中一段时间，曾要求加强敌情观念，打一场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人民战争，不让敌人利用存款破坏革命。这也属于严肃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动荡环境里，“好人”也不敢去银行储蓄了。马尚瑞住学校集体宿舍，不方便放钱，便每个月领到工资后，都让我帮他收着。他需要用钱了，就去我家里取，自己记个账，很信任我。“文革”那种环境里，和我们这样交往的年轻人不多。那难熬的十年，我们学校给过我最多帮助的人，就是马尚瑞，我永远感激他。

我印象中军宣队的人比较厉害。一次一个军宣队找我谈话，说到什么事儿时，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儿，就说周总理是怎么怎么说的。他一下儿就跟我拍起桌子来，说：“周恩来算老几！”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心想：这人是江青的爪牙呀！

□ 节选自《我这一百年》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二）

• 吴中杰 •

（上接 z k 1 9 0 9 b）

1月22日，张春桥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秘密会议，商讨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新市委，徐景贤带头鼓掌，大家随声附和，就算是各群众组织通过了。会场上只有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着手，不肯鼓掌，这场面当然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双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们走出会场时，“迅速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已经贴满街头，这当然更引起了胡守钧们的不满。形势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刷大标语，贴大字报。

张春桥后来在镇压参加“炮打”的学生时，几次发出指示，要抓后台。他认为，学生们的“炮打”行动，一定是长胡子的走资派在幕后指使的。其实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的怀疑，才发展成炮打事件的。后来，张春桥们又批判“怀疑一切”的思潮。其实，“怀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鼓动起来的。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才对传统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思潮，却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些不同。它虽然也打破了一些对于高官和教条的迷信，但却又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个人迷信思潮之下，缺乏独立的思想判断，所以怀疑常常为某种权力意志所左右。而且因为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保证，怀疑不待求证，即可成为打倒的根据，这就易于为阴谋家所利用。

既然张春桥们可以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来打倒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干部，那么，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因怀疑而向你开炮呢？当初猴子们凭着几条未经核实的怀疑材料，就贸然发动打张战役，实非无因，乃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但矛盾的激化，还与张春桥急于抢权的心态和睚眦必报的作风有关。

在“孙悟空”刷出大标语的次日凌晨，胡守钧等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徐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当时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里会在乎这种威胁，这种话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

“孙悟空”这一派，虽然敏感性很强，能量很大，但人数却不多。在复旦，在上海，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也马上动了起来。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条说：“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又如第9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复旦，自愿陪同徐景贤一起囚禁。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引到徐景贤的房间的，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所以1月30日贴出的《七问》大字报，是徐、郭二人共同署名的。郭仁杰原先在复旦哲学系担任过总支副书记，后虽调离复旦，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红革会的头头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贤，张春桥必然感到威胁，非跳出来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贤被扣的消息之后，张春桥马上采取措施。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要求放人，结果无效；于是又派上海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兵到复旦要人，这更激起红革会的愤怒，指责张春桥派兵冲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张春桥被迫亲自出场，他和姚文元一起来到上海展览馆红革会总部，试图说服红革会头头。但是这些头头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他们跳上台去，高喊口号：“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并且直斥道：“你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对于姚文元，则想采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隶主义”。这实在有些天真，当然不能取得什么效果。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不同意指名要他们接电话，说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他转达。这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问道：“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了6个小时，毫无结果。这时已是29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当晚，红革会召回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战士，在复旦登辉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几派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和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也都一起参加。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造反派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胡守钧、安文江、劳元一等几个头头争相发言，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未完待续）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